

品文集的书名借用了一个现代解释学的概念——视野融合。这一概念是德国解释学家、哲学家

舍德勒提出来的，而被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广为接受的一个概念，它主要由本文本意义与理解等相关问

题提出。且申著者的译法各异，如：视野融合、视界融合、视域融合、视窗融合，在此，我们还是

沿用“视野融合”一词，以求统一。一些相关的概念，如：视域、视窗、视窗融合、视窗理论等，在此，我们还是

沿用“视野融合”一词，以求统一。一些相关的概念，如：视域、视窗、视窗融合、视窗理论等，在此，我们还是

视野融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这里选用的“视野”一词，英文为VISION，其原义为“地平线”。视野融合因而可以理解为两个无限延伸的视野相交和相互映照的过程。一个是本文世界向外开放，另一个则是指读者的解读视野（即特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产生的各别的视域）。二者的交融之处，生成了当下的意义世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既不再是原有的本文世界，也不再是读者任意阐释的相对主义或虚无的世界。它同时具备两个不同世界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 阐释与对话

鲁 莹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主 编 / 鲁 莹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教材与外语图书事业部

(010)65281150

责任编辑 / 武 云

责任校对 / 潘 纲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25

字 数 / 17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190 - 321 - 8 / B · 033

定 价 / 22.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　　言

这部文集的书名借用了一个现代解释学的概念——“视野融合”。这是德国解释学家、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来，而被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广为接受的一个概念。它主要用于与文本意义与理解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之中。中译者对这个概念的译法各异，有“视野融合”、“视界融合”、“视域融合”等等。在此，我们还是沿用“视野融合”。从伽达默尔的经典释义来看，界定“视野融合”有点复杂，免不了涉及一些哲学、解释学的概念，例如什么相遇、预期、筹划、效果历史等等。好在接受美学或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此也有各自的界定和阐释。在此，拟借用接受美学理论，以一种更为浅近、明晰的语言来描述这一概念，以使读者能尽快地进入相关讨论。

所谓视野融合，就是本文世界（或称之为作者的文本意义世界）与读者世界在沟通、对话、交流过程中展开的各自视野（视域）间的融合。这里选用的“视野”一词，英文为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Horizon，其原意为“地平线”。视野融合因而可以理解为两个无限延伸的视野相交和相互映射过程。一个是本文世界向外开放，另一个则是指读者的解读视野（即特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产生的各别的视域）。二者的交会之处，生成了当下的意义世界。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既不再是原有的本文世界，也不再是读者任意阐释的相对主义或虚无的世界。它产生于前述两个不同世界的映射和交融之中，也就是在两种视野沟通、对话、融合后生成的当下意义。

应该说，因为“理解”和“意义”问题涉及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所以“视野融合”这一观念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解释学、接受美学的范围了。在此，我们几位同仁也是沿用这个概念将各自的研究成果结集的。此文集由若干个篇章构成，第一篇是“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趋同与融合”，第二篇“文本与解读：关于文本意义的几组讨论”，第三篇是“疏离与趋同：当代美国文学运动的两个重要流派”，第四篇是“认知与互动：建构语言交际能力的几个问题”，第五篇是“阐释与对话：翻译理论的嬗变与趋向”。稍加分析便可以得知，上述各个部分涉猎甚广，彼此之间跨度很大，但它们又都与理解、阐释、对话过程密切相关，因而与“视野融合”这一概念密不可分。这里有语言与文化的视野融合，有文本与解读过程中作者与读者的融合，有当代美国文学主流

引言

与边缘的融合，有建构语言交往能力过程中交往双方的融合，还有翻译理论所涉及的作者和译者的融合。总之，融合的理念一以贯之，且所有的研究都以英语语言文化问题为对象，故名曰《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篇 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趋同与融合	1
第一章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3
第二章 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历史沿革	25
第三章 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及研究方法	42
第四章 文化语言学与相关学科	54
第二篇 文本与解读：关于文本意义的几组讨论	67
第一章 意义建构与缺失：结构、构造与结构化	69
第二章 选择与切入：文学文本解读的重要前提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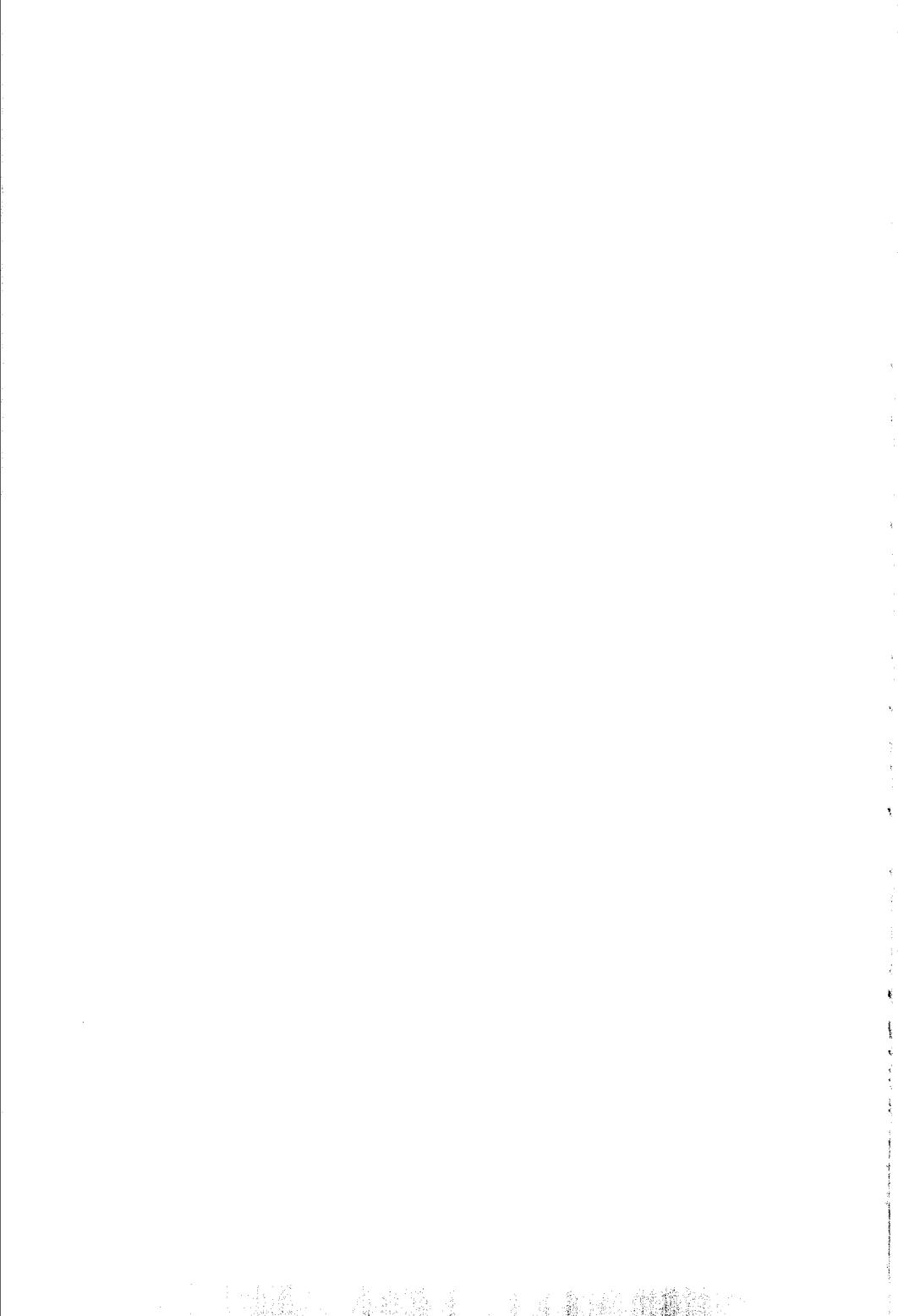
PB443/04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第三章 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读解现代英美文学大师的一种视角	95
第三篇 疏离与趋同：当代美国文学运动的两个重要流派	113
第一章 边缘与主流：当代美国黑人文学的“哈莱姆复兴现象”	115
第二章 历史的积淀与当下际遇：美国犹太文学的主流化进程	146
第四篇 认知与互动：建构语言交际能力的几个问题	167
第一章 认知语言学与语言能力构建	169
第二章 跨文化语境中的诠释与对话	180
第三章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往活动	194
第四章 交往与互动：建构语言交际能力的新路向	219
第五篇 阐释与对话：翻译理论的嬗变与趋向	229
第一章 文化视角：汉英词典编纂中的一个问题	231
第二章 中国翻译理论的演化与走向	241
后记	283

第一篇

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
趋同与融合



第一章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兴起

(一) 20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发展

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翻过了光辉璀璨的一页。自从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区分语言与言语并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观点以后，语言学告别了传统规定主义的桎梏，进入语言结构主义描写的新天地。从此，以语言本体为对象，对语言系统进行结构描写的语言研究观和研究方法盛行了大半个世纪。

20世纪中叶，美国人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始创的“转换生成语法”，区分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在先天语言机制说的基础上提出语言的普遍性和语言习得的理论，被称为现代语言学里的“一次革命”。转换生成语法关于深层结构中句法、语音和语义三者关系的分析引发了语言学界“三个平面”的大讨论并促成了现代语义学的产生。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不久，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观点，不论是早期的语言系统观，还是后来的转换生成语法及现代语义学，越来越暴露出它们自身的局限性：在解决语言实际运用的问题上几乎是无能为力。语言不仅是一种系统结构，而且是用以进行社会交际的工具。离开了语言的运用这一社会功能，语言的存在毫无疑义，语言的属性残缺不全，语言的许多问题也无从解答。

早在 19 世纪，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 (W.Humboldt) 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997) 中曾经阐述了语言与人类思维和文化的关系。他把语言看做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统一，认为语言形式潜在于人类心灵之中，内部语言形式是思想在语言中的表现方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1923 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B.Malinowski) 提出了“语境”的观点，并把语境区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 (E.Sapir)、沃尔夫 (B.Whorf) 等人，致力于实地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认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反映了人们的观念和习俗。他们把语言学看做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标志着人类语言学的开始。萨丕尔、沃尔夫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看法还成为语言学界轰动一时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由于当时世界语言学的主流是语言本体的系统观，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淹没于世人对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的一片欢呼声中。直到后乔姆斯基时期，当语言本体的

第一篇 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趋同与融合

研究观在实际的语言问题面前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时，当人们将目光转向语言外部更为广阔的视野，去考察与语言的运用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及其与语言的相互制约关系时，这些语言学和人类学家的思想才又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各种新观点、新尝试的理论基石和精神动力。于是，语用学、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应用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各式各样派生扩展的理论和流派，如雨后春笋般地接连出现，形成 20 世纪后期语言学里丰富多彩的万花筒现象。

回顾 20 世纪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变化，简言之，前期为语言系统论的一统天下，后期逐渐呈现出各种学派和理论竞相发展的多元格局。

(二)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与文化语言学的兴起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从总体趋向上说大致与世界相仿，同时又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以 1898 年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马氏文通》问世为标记，中国的语言学逐渐脱离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的体系，开始了语言学的现代化进程。1919 年“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这期间，一批著名的学者如赵元任、吕叔湘、王力等人先后留学欧美和日本，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的语言学从此与西方语言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代大师们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同时，努力结合汉语的特点进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行语法、音韵、方言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例如，光是语法学上的代表作就有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王力的《中国文法学初探》（1936）、《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何容的《中国文法论》（1942）、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

汉语的音韵学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进入20世纪后，汉语音韵学的研究也走向了现代化。其主要特征为：①建立了“纵推古今，横写方言”的系统观；②语音研究音标化，即采用国际音标对古音进行描写和构拟，使汉语音韵的研究达到了科学化。对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以瑞典人高本汉（Karlgren B. Johannes）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影响最大；在中古韵书系统及北音学研究上，国内的一批学者如董同龢、陆志韦、赵元任、王国维等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代音韵学的成果对20世纪汉语方言学的蓬勃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历来与音韵学密切相连。20世纪前半期，汉语方言学注入了系统结构的新鲜血液，运用历史比较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从现代方言调查的横向描写入手，做历史纵向的考本研究，同时进行方言与普通话以及各方言之间的特征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国各大方言进行分区。这一期间，以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罗香林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方言工作者，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调查了无数个方言

第一篇 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趋同与融合

点，写出了无数篇方言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方言学在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至于王力先生曾惊叹地说：“曾经有一个时期，似乎所谓语言学只有方言调查，或者再加上古音拟测，不但把中国传统的小学置之不顾，连现代语言学也研究得不全面，更谈不上渊博了。”（1981: 207）不仅如此，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在以后的时期里一直方兴未艾。袁家骅、丁声树、李荣、丁邦新、黄家教、詹伯慧、李如龙、鲁国尧、潘悟云等第二代方言学家一方面不断吸取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成果，一方面继续发扬汉语方言学的传统，坚持走自己的路，深入挖掘汉语方言里的文化内涵，为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建构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汉语语言学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如训诂学、文字学、修辞学等，在20世纪前期也都相应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中国的现代语言学就其产生的理论框架而言，毕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尤其这种理论的核心——语言的结构主义，是对语言采取静态的、孤立的描写，本质上具有忽视或排斥语言的民族性和人文性的潜质。另一方面，国内过去政治意识对学术领域的过多干预，使我国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种学术研究受到很大的制约。世纪中期的一段时间里，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整体上说几乎是停步不前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人们才突然发现，我国语言学的研究，除汉语方言学一枝独秀以外，已经同国外语言学的发展

视野融合：跨文化语境中的阐释与对话

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表现为我们在国外语言学的新观念、新方法面前的相对滞后，另一方面更表现为未能走出早期结构主义的狭隘观，未能有效地结合汉语传统文化的特点建立起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体系。第一个差距的追赶并不十分困难，近二三十年来已有一批现代汉语词汇学和语义学的论著相继问世。然而第二个差距的填补似乎不容易。这种情况在汉语语法的研究上尤为突出，直到现在，我们仍不能就汉语的词类、主宾语和单复句等问题做出能让各方都满意的解释，以至于学界里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从《马氏文通》至今已将近一百年，可是我们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认识仍然是一本糊涂账。

客观地评价，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曾经帮助中国的语言学走向现代化，但也使中国的语言学陷入了后期发展的困惑。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国人开始了深刻的反思和艰苦的探索。1979～1983年，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语言与思维”的讨论，人们的思想开始摆脱教条化和模式化的影响。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增多，国外语言学各种新的理论成果不断地传入我国，也不断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多元理论、交叉边缘学科、认知论、模糊论、跨文化交际等名称术语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概念。对语言问题的观察也开始从微观的层面扩展到宏观的领域。在新旧观念互相激荡的过程中，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率先冲破传统的研究观，对语言学界长期以来只讲

第一篇 文化语言学：语言与文化研究的趋同与融合

语言结构而忽视语言人文性质的状态进行反思，尤其是对长期套用西方语法模式来分析汉语语法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并倡导根据汉语社会文化自身的特点来重新审视汉语。

1980年，陈原先生发表专著《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标志着我国社会语言学的产生。1985年，方言学者游汝杰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在《复旦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上发表了《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设想。两人合作还于次年出版了同名专著《方言与中国文化》。这两篇同名的论著、论文吹响了文化语言学的号角，把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召唤到文化语言学的旗帜底下，使得在中国语言学界形成了一股规模不大的文化语言学新潮。1987年12月，中国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西山举行，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汇合一起，形成了更为壮大的实力和声势。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建民出版了《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从社会交际、地名称谓、语言接触等方面论述汉语言文化关系，代表了文化语言学内第二个流派观点的形成。第三个流派以申小龙为代表。从1986年发表《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一文起，申小龙在短短的五六年间连续出版了《中国句型文化》(1988)、《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1988)、《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1989)、《中国文化语言学》(1990)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在国内外刮起了一股“申小龙旋风”，在当时的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